

霸权、话语建构、反极权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空间转向

卢春雷*

〔摘要〕 处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逐渐转向了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以拉克劳和莫菲所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运用“话语”、“霸权”等逻辑消弭马克思主义阶级主体的正当性,以此回应现实社会政治变化的趋势,从而提出了激进、多元的民主解放的蓝图。阿伦特的反极权主义理论在 20 世纪后期可谓独树一帜,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而反对本质主义、反对极权主义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微观政治特征之一。

〔关键词〕 霸权;话语;社会批判;反极权主义;后马克思主义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西方左翼大都认为:进入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对抗和冲突不再发生在生产领域,而存在于生活与消费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失去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与中心地位,而各种新社会运动带着各自的诉求向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着强有力的挑战。它们不再像传统左派那样有着相对固定统一的组织和诉求,而是观点各异、“左”“右”混搭。它们以西方发达国家中传统工人阶级的衰落为理论焦点,围绕着新中间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分化研究,提出了异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非阶级政治的多元社会结构理论,试图从普遍主体的回归与完善人性的角度,探讨实现人类解放的策略与路径。

一、重释霸权: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策略之核

“霸权”理论显然来自于葛兰西。与卢卡奇一样,葛兰西明确地反对第二国际内部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并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宿命论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他指出:“甚至可以断言,就本质特征而言,当代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一具有历史政治性的领导权概念”^①。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赢得一切反资产阶级力量(特别是农民)的领导权,并把这些力量组合成‘一个

* 哲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223300。本文受江苏省哲社基金项目(13MLD015)资助。

①[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07 页。

新的、同质而没有内部矛盾的、政治经济上的历史性集团’”^①。

但是,以拉克劳和莫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是把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视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拉克劳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二版序言中明确写道:“只有葛兰西——其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的著述——这个孤立的例子,能被用来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他的著述中包含的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领导权、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这些新概念,是我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②而莫菲也表达了类似拉克劳的观点。她回答安格斯提问时说:“实际上,葛兰西为我提供了不同路径,因为我对阿尔都塞主义式的教条主义的不满意,……我开始研究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问题。你提到我的最初的工作是竭力去说明我们在葛兰西那里发现了一种没有变形的马克思主义,它给予我们的理论工具正好去理解那些在70年代开始壮大的新型的运动”。^③不过,他们在感激之余也表达了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不满。他们以为虽然葛兰西用“历史性集团”取代了列宁的“阶级联盟”,并将霸权领域由“政治”领域拓展到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智识的和道德的”领域,同时有意识地撕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关联性,但这样的撕裂总体上是谨小慎微的。换句话说,第二国际以来的经济主义观念还被保留在葛兰西的霸权理念之中。

在齐泽克看来,在严格意义的政治学领域中,今天左派中的大多数屈从于右派的意识形态的“敲诈”,并且也接受了它的基本前提——第三条道路。不过,在这一点上,拉克劳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左派的危机可以被看成是两个传统话语的失败:共产主义和西方福利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右派卷土重来并获得了社会的霸权地位:甚至社会民主党都已经倾向于把它的前提作为一种新的和不可更改的常识接受下来。这样现实的结果必然是使得左派失去了过去的想象而退却到只有防御的境地。显然,为了改变这种尴尬的处境,左派必须形成新的想象,并作出新的政治选择,而这一选择可以用霸权逻辑去实现。但是,面对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的权力和功能的削弱以及国际范围内准国家组织的增长的实际,要使得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大多数术语能够适应于当代环境的话,就必须要被激进化和重新定义,即重新诠释霸权。拉克劳借助霍布斯的权力理论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权力不可能是平均地在社会各种力量之间进行分配的,同样每个人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的话社会同样是不可以存在的。换句话说,正是由于权力的不平衡状况,才可以使得某种集团声称它的特殊目标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目标,这也就是“霸权”行为的本质所在。

因此,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为了使得霸权理论的功效得到完全地展开,就应该“要求社会主义力量以一种比葛兰西的阐述更进一步的方式来发展霸权概念”^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认为“重新阐发葛兰西的范畴一直是我作品的主旋律”^⑤。经过重新阐发过后的“霸权”拥有了四个维度的内涵:第一,权力不平衡性是构造的;第二,一旦淘汰了普遍性/特殊性的二分法,霸权就会形成;第三,霸权的存在需要虚空能指的产生;第四,霸权代表着社会秩序构造的条件。^⑥质言之,在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霸权实践,是由社会的开放性和每一种能指的不固定性所决定的建构社会统一的实践。这样的实践是取代前定阶级之间联盟的实践,是弱化所以必然形式、消解存在必然中心的实践,是重新发现客观性的偶然特质的实践。

正是源于对霸权的如此重释,拉克劳认为,“在霸权规划中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仅可能是它努力占据这一位置的结果;它并不是其他集团被迫承认和先验地接受的特定位置。就党的作用而

①[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206页。

②[英]E.拉克劳、C.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③④⑤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78、52、150页。

⑥[斯]齐泽克等:《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8-219页。

论,……在我们现已界定的宽泛意义上,仅只构成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它们必须与多种多样的自治性社会运动共存并一起共同起作用。”^①也是源于对霸权的如此重释,后马克思主义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所谓的新的时代,它是“一个没有以往任何偏见、没有把自己展现为历史‘绝对真理’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建构着新的解放话语,一个更人性化,更多样性、更民主的话语。末世论与认识论的雄心更为谦和,但解放的期望则更宽广、深厚。”^②

之所以后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葛兰西的“霸权”并加以重释,究其原因:第一,构建其理论的需要。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扩大“霸权”的外延,才能够撕裂基础/上层建筑的逻辑关系,颠覆第二国际后期以来形成并一直被赋予至高无上地位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尽管列宁主义代表着经济主义瓦解并向政治优先性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念前进了一步,尽管葛兰西的霸权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霸权,而且还包括文化的、道德的和意识形态的霸权,但是,由于他们还存在着经济本质主义幻象,因此,他们也只是仅仅修正了经济/上层建筑的关联性,还不足以撕裂二者的逻辑关系,不能给予政治的本体地位。所以,只有扩大霸权解释的空间,给予政治本体优先地位,才能使历史力量被赋予充分积极性,确实地探讨马克思主义范畴在当今的有效程度。只有重新整合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使“霸权”范畴脱去其本质主义的枷锁,并使其建立在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复杂的基础之上,从而为实现其激进民主的政治构想创造理论条件。第二,厘清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之间瓜葛的需要。后马克思主义运用霸权逻辑,将其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试图将其理论打造成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没有变形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哥白尼式”变革。虽然拉克劳从不否认他们理论与德里达、福柯、维特根斯坦等人理论之间的关联性,但他们总是尽力保持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距离。我们只要仔细比较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后,就能发现他们与后者之间的明显差异,那就是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并不像后结构主义那样,进行简单地“破坏性”的解构工作,而更是从事“建设性”的建构工作,以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然而问题是:“他们却几乎没有作任何分析来说明:如何去建立以及维持联盟?围绕什么问题去建立联盟?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联盟方式?”^③

二、话语建构: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之管道

显然,将“话语”作为阐述自己理论的核心范畴,后马克思主义不是第一回。不过,用“话语”消解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它无疑是第一个。因此,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正是通过‘话语’范畴,近些年来许多理论家才坚定地从前期的革命政治立场慢慢转向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这一现象被普遍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④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和莫菲开始“去损毁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将是社会主义变迁的主力军的观点之基础,并代之以一种政治方案,这种政治方案的目标是‘激进民主’,其主体是一种人民同盟,这种人民同盟不是由阶级关系构成,也不是由任何决定性的社会关系构成,而是由话语构成的。”^⑤

拉克劳和莫菲认为“话语”就是“来自连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⑥它是“在其自身之内包括语言成

①④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第62-63、318页。

②[英]E.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③[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64页。

⑤[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⑥[英]E.拉克劳、C.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114页。

分又包括语言外成分的整体。”^①因而,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每个对象都是被话语构造的对象,“每一个客体被构成为话语客体的事实与是否存在外在于思想的世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没有关系。”^②按照这样的解释,那么在我们通过自己的话语开始把实在构建起来之前,实在本身仅仅是某种无法言说的未知东西。因而,在伊格尔顿认为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的一个很明显的缺陷。伊格尔顿认为,如果我们将对象完全内在于构成它们的话语之中,那么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判断一种话语有效地建构了它的对象?与此问题相一致的还有包括:“人们究竟怎样又是错误的?如果不能有一种元语言来衡量语言和对象之间的‘符合’,什么可以来阻止我用我想用的某种方法来建构对象?”“如果证实我的社会解释的是它们所服务的政治目的,那么我如何证实这些目的?或者就像尼采可能竭力主张的那样,我正好被迫以武断而又具有侵略性的方式来坚持我的利益高于你的利益?”^③的确,上述问题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而言是很难回答的。

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自维特根斯坦以来,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建立严格的分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能,它们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很模糊,而“词语的意义完全要视语境而定,这一点正日益为人们所接受”^④。也就是说,每一个身份或话语对象都是在行为的语境中形成起来的,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社会与话语是完全等同的”,“自然事实也是话语事实。”^⑤因此,拉克劳和莫菲认为,在人们与世界的交换过程之中,对象从来没有向人们呈现为纯粹存在的实体,它们总是在话语接合中向人们呈现它的存在。就像“树木可能是原材料,或者是制造品的部件,或者是森林沉思的对象,或者是阻挡我们前进的障碍物”^⑥一样,人们遇见的总是存在于某一个具体话语情境之下的接合的事物,因而在语境之外,对象没有所是(being),只有存在(existence)。针对拉克劳和莫菲的上述观点,杰拉斯认为:不仅拉克劳和莫菲的“一切都是话语,话语语境无所不在,还有那些由此而来的各种决定。……恰恰也是一种本质,”而且,“话语:也即千差万别的具体之种那个还原的抽象”,“‘话语’的首字母也可以大写成‘D’。这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是因素和类型构成的绝对的一团乱麻。”^⑦

就其实质而论,后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话语”的根本原因就是取消工人阶级作为未来社会政治变革行动的具有特权的力量主体,“一旦拒绝了作为‘普遍阶级’的工人阶级概念,才有可能认识发生在被归于‘工人斗争’标签下的那些领域中的对抗多元性,并且认识它们大多数对于深化民主进程具有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工人置身其中的其他一些社会关系将会决定他们在工厂之内的反应方式”。^⑧因此,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来说,实现其激进和多元的民主的策略,不再希冀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关于未来社会革命的主体是清晰的,即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但是,后马克思主义运用“话语”、“链接”、“错位”、“霸权”等概念消解了工人阶级的当然主体身份与地位。在他们看来,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阶级结构不但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进行演变,而且就工人阶级运动而言,“倾向于越来越少地对——已经稳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怀疑,而是集中在为改革生产关系所进行的斗争上。……因此,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从属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被作为合法化的不同立场,纳入一个统一的话语空间。”^⑨而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还是在第三世界,包括都市的、生态主义的、反权力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女权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少数民族权力的、地区的或性少数的斗争等在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面对这种变化,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民的身份认同不能再围绕着阶级为核心来思考,而正相反,它是完全开放的。它们可以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指导展开,它们

①④⑤⑥⑦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05、106、107、108、96页。

②⑧⑨[英]E.拉克劳、C.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118、187、175页。

③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第321页。

可以让位给那些意识形态的特性不是在一开始就被决定了的运动。”^①

正如艾伦·伍德所言,对于革命“替身”的追寻,已经成为了当代(欧洲)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在话语逻辑之中,在等同/差异逻辑之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之外,妇女、同性恋者、包括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都可能成为导致社会主义的因素。于是,后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设计了一种新的方案:激进的、多元和竞争性民主。在这样的方案里,社会主义已经再也不是与资本主义来个千禧年式的决裂,而是一方面吸收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批判和抵制资本主义社会反民主的行为,并将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式进行“接合”,使得民主运动推广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种社会群体以及所有的日常生活空间。显然,在这样的民主话语中,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享有特权并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任何一个主体都是在不确定的和偶然性的逻辑中被话语建构起来的结果。因此,主体所呈现的最明显的,也是最根本的特性就是被分散化和零碎化。

然而,用“漂浮的能指”来形容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体”概念再恰当不过了。“新社会运动”的确是后马克思主义十分感兴趣的话题,但拉克劳和莫菲也万般无奈地指出,“新社会运动”一词其实是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术语,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术语”本质上是为了否定为了“阶级”斗争的工人罢了。虽然后马克思主义尽力强调他们对于新社会运动的兴趣,认为“不是它把各种斗争归属为与阶级观念相对的一个范畴,而是它在把迅速消融的社会冲突解释为越来越多的关系方面所起的新作用”^②,但是由于认为一切都是话语建构的结果,所以正如伍德所指出的那样:“在最后,不单单是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被拉克劳与莫菲认为是没有潜能的。……那种其自身具有的集体角色认同、利益与能力能够代替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基本物质力量的其他社会因素也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任何一种政治都不存在社会基础。话语就是一切。”^③

三、反极权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之共相

反极权主义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共同的主张。在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阿伦特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标杆性人物,也正是其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成就了汉娜·阿伦特在20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中的举足轻重的位置。正如比库·帕勒克所评价的那样:“阿伦特对政治性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她那样给予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④阿伦特在《论革命》的过程中又探讨了《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并且给人们讲述了《极权主义的起源》。

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拉克劳等人认为,一是与某种“绝对统一”的政治逻辑和本质形式有关,也即与某种外在的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有关;二是与国家拥有“绝对真理和绝对权威”有关;三是源于极权主义试图“理性地”重建整个社会结构和强制性地控制一切错位和不平衡的结果。在阿伦特看来,由于权力与暴力的混同与混用,使得暴力很容易成为对抗真正政治堡垒的借口和理由,它可以去颠倒一个真正的政治空间并成为支撑这一被颠倒了的空间的后盾。极权主义的形成其实就是这种混同与混用的最直接的结果。它具体源于:接连不断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蔓延;一般民众的支持,尤其是暴民们公认的动机、

^①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第177页。

^②[英]E.拉克劳、C.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178页。

^③[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第74页。

^④[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封底。

目标和实践;最后,一切极权主义归根到底都是人的欲望和野心的产物。^①

作为一个遭受纳粹主义迫害的犹太民族的杰出分子的阿伦特,“集中营”、“大屠杀”等带有明显暴政和专制的特征的概念深深地印在她的记忆中。由于民族身份的独特性,因此她比其他的学者更能认清法西斯主义、独裁主义和官僚政治的危害性,并对国家社会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泛民族主义等对人权的侵害深恶痛绝。她反对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认为极权主义是人类最为恐怖的政治现实和统治方式,无论是何种国家,只要是极权主义占统治地位,它就会导致该国家的毁灭。由此,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的扩张变成摧毁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力量”。^②

按照阿伦特的理解,极权主义的形成与人们将权力与暴力、必然性与暴力混同和混用有关,也就是说由于“暴力”被广泛认可与运用催生和固化了极权主义。阿伦特认为,自柏拉图以降,任何一种统治形式都是由法与权力这两大基本核心概念来支撑的。所以一方面,人们总是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法治统治被认为是好的统治,无法治的统治是坏的统治;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权力的理解是权力不能由个人所有,它只能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一旦暴君个人占有了权力,权力随之消失并被暴力所取代。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经验和政治事件中,由于暴力与权力的混同,再加上暴力对必然性的取代,所以极权主义成为了现实政治事件中的经常的现象,而“我们所知的权力根本不产生作用,或者至多只有次等作用。”^③因此,在极权主义者那里,暴力、权力被进行了“科学”地论证,他们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是宇宙的规律,人必须按照这样的规律来表现自己。于是,“暴力、权力、残酷都是人的最高能力,人在宇宙中无疑失去了地位,而又过分自傲地渴望有一种权力理论,借以将他们安全地带回到世界,与之重新整合。”^④

阿伦特同时还认为群众社会异质的一致性为极权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固然,在政治事件中,人们可以在意见自由、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达成意见的某种一致性,但是在极权主义与其暴力之下,一致性往往发生了扭曲。这种扭曲的标志就是所谓公民的“全体一致”。在阿伦特看来,在事实上,在所有意见都一致之处,是不可能形成意见的。因为在多数人势不可挡的权力下,少数的声音丧失了一切力量 and 一切说服力,“全体一致”的意见煽动一种一致反对,到处扼杀真实的意见。所以,当希特勒在说出“你们之所以是你们,是因为我;我之所以是我,只是因为你们”^⑤的时候,其实,只表明了同一个意思,即“希特勒”就是“你们”,“希特勒的意见”就是“你们的意见”。由此,阿伦特认为作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总是运用说服、权威或者暴力将自己的意志强行地赋予那些被剥夺的群体,从而使得异质的群体的绝对同质性的形成。

几乎在同一时刻,与阿伦特一样有着犹太血统的以色列人塔尔蒙也写了《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的著作。在该书中,塔尔蒙认为,极权民主主义既是欧洲民主主义传统的自然传承,又是在18世纪法国新生的一种形态。同时,他又将极权主义民主分为左翼极权主义和右翼极权主义,并声称“对于左翼极权主义来说,理性是一个整体力量,他们预先假定人类是由相关存在的理性主义者形成的总体。右翼极权主义中隐含了对这样一个整体的否认,否定对人类价值的普遍性。”“左翼极权主义宣称人类的天性本质上是善,具有一定完美性。右翼极权主义则宣称人类的本性是软弱和腐败的。……左翼极权主义,在其诉诸武力时,人们的头脑更加坚信使用武力仅仅是为了加快人类前进的步伐,使之达到至善至美和社会和谐统一。因此,左翼极权主义认为采用的这一民主形式是符合法律规范的。这种形式却不会被右翼极权主义所采纳。”^⑥如果阿伦特赞同塔尔蒙的这一分类观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她所论述的极权主义则是塔尔蒙视域中的右翼极权主义。所以在她看来,宪法是革命的最终产品,也是革命的目的,于是“保障公民自由,保障对私人幸福的追求,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一切非暴政政府的本质,统治者是在法律

①张之沧:《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理念》,《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②③④⑤[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01、422、429、423页。

⑥[以]J.F.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孙传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页。

范围内进行统治的。”^①而暴力就是故意对市民社会法律的违抗,是对多元主义的威胁。作为极权主义统治者除了使用暴力和威胁之外,还不得不借助说服、宣传和灌输构建出一套类似法律的规范和道德的要求,尤其是在它们掌权之后,开始从总体上组织国家,接着宣布他们的意识形态,声称他们的组织必将包容整个人类。因此在实际上,“极权主义运动采取纳粹主义方式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方式,以种族还是阶级的名义组织群众,假装遵从生命与自然的法则还是遵从辩证法与经济学的法则”,^②其实并无本质区别。然而,政治经验和常识会摧毁极权主义的虚构与虚伪诉求,结果是:执政的极权主义不得不面对来自现实的各种挑战,各种宣传和组织再也无力“宣称不可能的事情可以成为可能,或者不可思议的事物可以是事实,或者疯狂的坚强可以统治世界。”^③在建立一个运动的虚构世界与防止新的世界稳定的荒诞的矛盾之中,极权主义的虚伪的面纱必然会被扯裂,法律和制度又一次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之中。

四、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策略的本质评析

就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策略批判想象的表达而论,鲍德里亚更加直接、更加彻底。他打着“终结政治经济学”的口号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着“终结性”的消解,随着“生产方式”的消解,鲍德里亚认为,不再是“生产”而是“消费”控制了人们了的全部生活,“消费”已经成为了巨大的政治领域。

必须承认的是,由于时代发展和当今科技革命对社会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个别观点或结论以及在19世纪所做出的某些具体理论预言,在21世纪的今天,的确是不合时宜了。这一点诸多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客观地说,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的失效的重新思考、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格局的新变化、苏联东欧剧变和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等方面表现出了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同时,他们力图从整体上对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批判性的反思、修正和改良所得出的一系列新的社会策略理念,对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域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然而,英美新左翼往往是借助对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为幌子悬置起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内核——无产阶级。诚然,在当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权主义的运动、生态主义的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等被称为“非工人的非阶级”行为的确不再以阶级的面貌出现,不能简单地被还原为阶级斗争。但是,面对并不取向获得政治权力和国家机构,而是取向自治领域和面对面系统的独立控制各种新社会运动,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这些社会运动虽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它们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就不能脱离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只有极少数情况例外,例如作为单纯对权力的向往。”^④

其实,在后现代语境里,“主体”一直是遭到颠覆和解构的对象。在弗兰克看来,启蒙运动的最大成就是“主体”的发现和弘扬,然而“主体”说到底只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一种虚构而已。拉康则借助言语活动将“主体”改变为“主体间性”。福柯凭借系谱学的考古指出:“既没有个体的主体,也没有集体的主体……,人只是历史的产物,其本身是由话语实践决定的”。^⑤而以拉克劳和莫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借助“话语”逻辑与“霸权”逻辑,用“主体身份”(subject position)替代了“主体”。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主体不过是霸权链接的产物,理所当然地是,任何一个主体从来也不具备所谓“本质”和“优先地位”的特征。阶级主体只不过也是这种链接产生的众多可能主体之一。按此逻辑,他们也就

①[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第117页。

②③[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408、497页。

④李慧斌、李朝辉主编:《后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38页。

⑤李惠国、黄长:《重写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很轻松地实现了解构未来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主体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拉克劳一直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一种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然而一旦将无产阶级抽离,马克思主义变成没有了无产阶级的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还能是什么呢?所以,当新左翼的革命策略一经提出就必然引起诸多学者的“激烈的、甚至恶毒的批评”。在众多批评者中,伍德的批判更值得我们重视。在伍德看来,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基的简单的对其脱出,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甚至是与社会主义的一切作了告别。她认为,“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和他的合作者 C. 墨菲,开始去损毁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将是社会主义变迁的主力军的观点之基础,并代之一种政治方案,这种政治方案的目标是‘激进民主’,……不是由阶级关系构成,也不是由任何决定性的社会关系构成,而是由话语构成的”,^①其结果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和对立完全概念化了”^②。

概言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政治”的革命规划与设计生成于既不能依赖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但却又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的替代所存在的问题的两难困境之中。它在后一马克思主义与后一马克思主义的语意迷乱中改变着马克思主义的遗传密码,却又无法给出因为遗传密码的改变导致马克思主义“癌变”不会发生的承诺。借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它“是这样一种话语,它通过各种各样的声音,以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不仅诊断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模式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终结,而且诊断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的终结”,而“这种胜利者的话语,有时在政治上则是歧义暧昧的,而且像独断论一样,像所有的咒语一样,在暗处使人忧心忡忡,在明处也使人焦虑不安”。^③这不仅是对后马克思主义本质及其走向的诠释,也是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西方“新左翼”本质与走向的诠释。

随着苏联解体和经济全球化等带来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剧变,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也是该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诸多问题也接踵而至。即使在今天,在面对其中的任何问题,我们依然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非凡贡献。当然,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创作的作品无法完全描述当今世界的最新进展。可是,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根本就不是只停留在 19 世纪。这位人类第二个千禧年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依然会成为人类第三个千禧年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责任编辑:杨嵘均)

Hegemony,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and Anti-Totalitarianism: Changes in Post-Marxist Social Criticism

LU Chun-lei

Abstract: Western Marxism in the context of post modernism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 a post-Marxist theoretical paradigm from the 1960s. This new paradigm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heoretical endeavors. By employing the logics of discourse and hegemony, Laclau and Moffet, two representatives of post-Marxist theorists, tried to deconstruct the legitimacy of the class as single dominant notion for doing social analysis in response t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and have advanced a plan for a radical and democratic liberation characterized by pluralism. Ahrendt, another great post-Marxist theorist, proposed her unique theory of anti-totalitarianism that is full of originality and insights. The post-Marxist paradigm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its promotion of anti-essentialism and anti-totalitarianism.

Key words: hegemony; discourse; social criticism; anti-totalitarianism; post-Marxism

^{①②}[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第 53、75 页。

^③[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81 页。